

石璋如先生與台灣考古學



2002年9月27日劉益昌先生與石先生談舊莊遺址（本院蔡元培館北山角下宿舍，現址為基因體研究中心）的發掘情形。

劉益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古今論衡 第12期 2005.03

台灣的考古學研究始於日本領台的第二年（1896），1945年8、9月間戰爭雖然結束，但隨後而來的國共內戰持續在中國進行，台灣的學術界與重要行業仍留有相當數量的日本學者與技術人員，考古學界也不例外，這種情形直到1949年國府撤退來台，才逐漸遣返日籍人員，結束留用狀態。1949年8月，日本籍考古學者國分直一先生留下台灣先史考古學研究的衆多資料以及田野工作，依依不捨地離開了台灣。在他離去前一年冬天（1948年12月8日），以安陽考古發掘著名的學者李濟教授和他的同事石璋如教授、高去尋教授躲避戰亂，來到台灣。1949年夏天，也就是國分先生準備離開台灣大學文學院前夕，李濟教授在籌備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之餘，已經和本地籍的陳紹馨教授帶著台灣大學史學系助教陳奇祿先生，學生何廷瑞、宋文薰、劉斌雄等先生，前往台灣山地地區進行民族學調查工作，途中並前往著名的埔里大馬璘遺址進行調查工作。^❶日治時期乃至戰後初年，由日本人主導的台灣考古學與民族學的調查、研究，至此進入新的階段，一個新的研究社群漸漸成形。（國分直一 1951）

這些從安陽來的考古學者，對日後台灣考古學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李濟之先生規劃考古學研究與發展的藍圖，高去尋先生形成中國考古學與上古史研究的模型，石璋如先生則對台灣考古學中田野工作的影響最為深遠，主要的原因在於石先生實地參與台灣考古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將考古學研究的方法，尤其是田野工作的方法，傳承給下一代的考古學者，形成一個深厚的台灣考古傳統，至今依然。2004年春天，石先生以百歲以上高齡離開他一輩子鍾愛的考古學研究，作為史語所考古組的一份子，也和石先生一起工作多年，同時合寫《大馬璘》（1987）這一部國人第一次在台灣進行發掘工作的考古發掘報告，個人謹就所知為文，用以紀念一輩子和考古學為伍的石先生。

❶ 1949年7月，以陳紹馨為團長。團員有李濟（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主任）、董作賓、石璋如、陳奇祿、劉枝萬等11人組成之「林氏學田山地調查團」，舉行瑞岩民族學調查，李濟擔任人類學計測、芮逸夫負責系譜、董作賓負責曆法，石璋如與陳奇祿調查物質文化，何廷瑞與宋文薰兩人擔任通譯。7月20日到達埔里時曾由劉枝萬（埔里人）、宋文薰領導前往愛蘭台地的大馬璘遺址作短期考古調查，參觀謝添發及芝原太次郎先生之收藏品，引起團員極大興趣。該團之考古經費原擬發掘台中縣大肚溪北岸營埔遺址，因營埔遺址當時是水田，尚未收割，不能立刻工作，於是李濟先生與林氏學田商量，改以大馬璘遺址作為發掘對象。11月10日，石璋如先生和陳奇祿先生到埔里與地方熱心學人劉枝萬先生籌備發掘事宜，商得地方人士同意，團址借用愛蘭國小校長住宅內。11月12日全體團員進駐，13日勘查工作地，14日展開發掘工作，至12月1日結束。除雨天外，實際工作天16天，此為大馬璘遺址第四次發掘，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發掘工作。

一、來自安陽殷墟的考古家

石先生是河南省偃師縣人，就讀河南大學的時期（1928.9-1932春），正是本所在安陽殷墟發掘工作的初期，本所第一次發掘殷墟在民國17年10月，正是石先生入學初期，因此石先生有機會在大學一年級聆聽主持安陽殷墟第一次發掘的董作賓先生演講殷墟發掘的情形，因而引起他對考古學的興趣。1929-30年因為河南省與中央對抗抵制殷墟考古發掘，中央研究院與河南省協商後而衍生的條件，使得大學三年級時，石先生和同學劉耀奉學校之命，派遣前往安陽參加殷墟考古實習，因此得以河南大學學生的身份參加中央研究院殷墟發掘團，從民國20年3月起「我就以大學生身份在安陽實習，參與安陽考古，也自此與考古結下不解之緣。」（陳存恭等2002：58）這些機會和緣分造就中國考古學界一位重要的學者，日後也為台灣考古學帶來重大影響。就石先生的學習與研究歷程而言，筆者認為以下三項對台灣考古學發展影響深遠。

（一）田野考古發掘

石先生從中國考古學建立初始的殷墟發掘就接觸考古學研究的相關資訊，隨後並參與考古發掘工作。民國19年末殷墟發掘第四次開始擔任實習學生，參加短期發掘，開始學習考古田野工作；民國20年秋天第五次殷墟發掘仍以學生身份參加，開始全程參加發掘工作；民國22年10月第七次殷墟發掘開始，正式加入發掘團，成為史語所的一員；民國26年3-6月第十五次殷墟發掘，也就是最後一次發掘，石先生擔任現場指揮發掘的負責人。從參加發掘的實習學生到指揮發掘的負責人，長達六年以上完整的田野歷練，學習各種不同發掘方法，累積深厚考古田野發掘經驗，形成考古發掘田野工作的整體方法。這些發掘方法可說是第一代中國考古學者參考西方田野考古學方法，加入對於華北地區地層特性而建立的考古學田野方法，這些考古田野方法當是史語所考古組創立初期由李濟、梁思永、董作賓等諸位先生根據地理環境及經驗累積所思考創立的一套田野發掘方法。石先生曾經描述李濟先生所使用的田野考古工作方法，隨著時代排列起來，差不多等於一部發掘方法的歷史，從1. 西陰村的「剝蔥」發掘與「三點測量」及「層疊記載」法，2. 安陽殷墟發掘時期的小屯的不連貫，縱、橫、連、斜、支及點的發掘法，3. 不連貫與縱斜方法兩者兼施的發掘法，4. 縱橫連支線的發掘法，5. 簡化縱橫線的發掘而改為ABC等區的發掘方法，最後從殷墟第四次發掘開始，利用吳金鼎先生發掘山東城子崖遺址的經驗，6. 開始進行制度化的發掘，規劃發掘網依每十公尺見方為一個單位，用等距離、等長度的探坑來發掘，建立了全面性的發掘方法，這一套方法按石先生的說

法，就是田野考古人員對一個新發現遺址發掘工作的四個步驟，亦即點的探找、線的觀察、面的揭開、體的發掘。（石璋如 1975：10-11）這些考古發掘方法，其實就是考古田野工作方法中有關層位、遺跡、現象發掘與記錄的不同方式，石先生所說的四個步驟也就是今日考古學發掘中的抽樣發掘（包括隨機抽樣與系統抽樣）、探溝發掘、塊狀區域發掘以及方格系統發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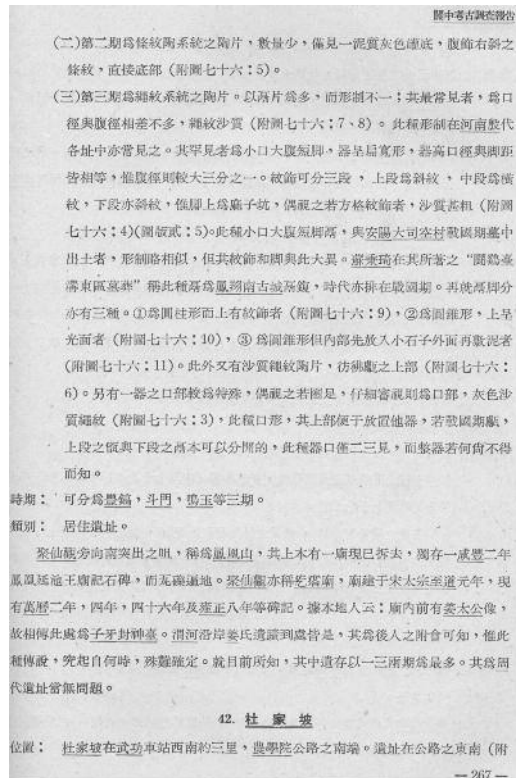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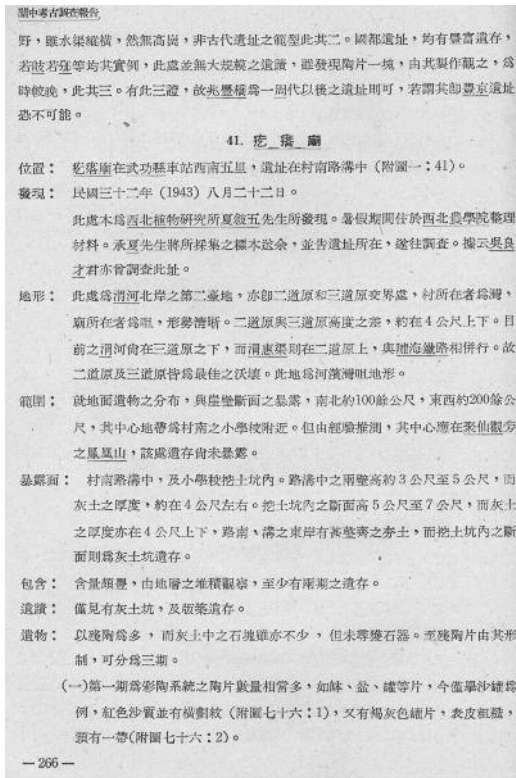
左圖為安陽殷墟第六次發掘以探溝發掘方式進行甲四基地東面發現的一行礎石；右圖為安陽殷墟第六次發掘B區全面發掘的景像。（影像提供：史語所安陽工作室）

（二）田野考古調查

民國 26 年中日戰起，殷墟發掘工作不得不停止，這個機會恰好給石先生歷練考古學田野工作另一重要部分，也就是田野調查部分。八年戰爭與史語所播遷過程中，一路調查、研究不綴，綏遠、隴東、蒼洱、敦煌、黑水、關中等區域，石先生都親自調查、記錄，足跡遍及後方之西南、西北以及關中地區，調查過的遺址多達 180 處以上。^②其中最重要的過程是民國 31 年初，史語所派勞榘先生與石璋如先生到重慶參加中央研究院與中央博物院及中國地理研究所組成的「西北史地考察團」，在民國 31 年調查了甘肅、寧夏地區，主要調查千佛洞、玉門關、陽關以及黑水流

^② 石璋如先生調查的遺址紀錄見於《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陳存恭等 2002），附錄一。

域，民國32年調查陝西的周都地區，這些調查工作不但增加石先生本身田野發掘工作以外的考古田野經驗，石先生所採用的調查表格詳細記錄遺址，也建立田野考古調查的新典範。



石璋如先生進行關中地區調查時記錄疙疔廟遺址之各項資料（引自石璋如 1956：266-267）

(三) 考古學類比研究

對於考古學者而言，考古發掘所引起的問題，必需在考古田野工作與後續研究中解決。石先生長年在殷墟發掘所引起的問題，自然以考古發掘現象以及器物使用功能的推論有關。例如「穴窖」，亦即考古發掘時發現的「灰土坑」功能究竟為何的問題，石先生藉著前往綏遠調查，從農村糧窖的調查與口訪，得知「糧窖內若有麥子腐朽，通常土壤成灰色，油菜籽腐朽就會是綠色，我們才曉得種的作物不同會影響泥土的顏色。」（陳存恭等 2002：175-6）類似這樣的調查，擴及於民俗、傳統工藝和生活形態的調查。暫居雲南之時，在龍頭、瓦窯、宜良、呈貢等地，從事農村社會、民俗、建築和手工業調查，可說是帶著當時尚未流行的考古學類比與民族考古學風氣。

二、來台初期調查與傳承

戰後史語所從四川復原回到南京，正想在南京安定進行研究工作的史語所同仁，卻因「國共內戰」再度搬遷，不過這一次不再是全所遷移，只有部分研究同仁隨著標本、圖書遷台。1948年底石璋如先生帶著安陽殷墟考古發掘、研究以及多年的考古調查經驗，隨著傅斯年所長與考古組主任李濟之先生遷來台灣。這個機緣，對當今台灣考古學有著重要影響。

秉承史語所考古組同仁一貫的精神，1948年底來台第二天（12月8日）石先生就和李濟之先生與組內同仁前往圓山遺址調查。（陳存恭等 2002：335）1949年7月參加「林氏學田」資助的泰雅族瑞岩民族學調查，同時調查大馬璘、營埔二處遺址，選擇來台後第一次發掘地點。1949年11月參加大馬璘遺址發掘，實地率領發掘團隊進行發掘工作。1951年10月與方豪、宋文薰先生一起調查淇里岸、江頭（關渡）遺址，1949-51年間數度調查手工業與生活習俗，例如楊梅的磚瓦業、鶯歌的陶瓷業、楊梅的土葬等。來台初期的調查、研究中最重要可說是1949年底大馬璘遺址的發掘工作。

大馬璘遺址發掘，名義上由李濟之先生領隊，實際上是石先生負責田野發掘及日後的研究工作，率領高去尋、潘愨等殷墟發掘的前輩先生，帶著台灣大學史學系的助教陳奇祿，四年級學生何廷瑞，三年級學生宋文薰、劉斌雄，進行來台第一次發掘。從遺址選定、發掘區域劃分到探坑佈設的發掘前半部，到實際發掘中地層記錄、墓葬及相關現象記錄、測量，最後的資料處理，各種過程無一掛漏，傳承考古發掘經驗給第一代台灣考古學者。

這次考古發掘工作深具意義，台灣第一代考古學者宋文薰、劉斌雄，除了受到日本學者金關丈夫、國分直一等先生的考古學知識傳承以外，同時從大馬璘遺址發掘的訓練中獲得安陽殷墟發掘深厚的經驗傳承。大馬璘遺址的發掘工作，雖然不是台灣大學史學系的「考古學田野課程」，但當時何廷瑞、宋文薰、劉斌雄三位先生都是史學系的高年級生，參與發掘的石璋如、高去尋、潘愨等諸位先生都是已有考古發掘經驗的工作者，從實際工作情形而言，這一次的發掘也許可說是考古人類學系成立之前的「考古學田野課程」。就後來在考古人類學系教授田野考古課程的宋文薰教授而言，大馬璘遺址的發掘工作應當是第一次正式的考古田野工作。

當時在埔里地區擔任中學教師的劉枝萬先生，也因興趣於考古工作而於發掘與後續調查工作中受教於石璋如先生，在1950年代以後和宋文薰、劉斌雄先生同為台灣第一代從事考古研究工作的考古學者之一。

三、在台灣的教學與研究

1949年7月，台灣大學文學院在李濟先生的努力之下創設了考古人類學系。主要的教學成員幾乎都來自於史語所的第三（考古）和第四（人類）組，其中考古組的成員有李濟、董作賓、石璋如和高去尋先生，人類學組的成員有凌純聲、芮逸夫先生，加上原本的陳紹馨以及從歷史系聘任但擔任考古人類學系必修課程的李宗侗、劉崇鋮和勞榘先生，（張光直 1995：109-110）這個堅強的陣容，正式取代戰後1945-49年間留用於台灣大學的金關丈夫、國分直一、宮本延人等諸位先生教授的考古學與民族學。

石璋如先生從1953年起教授四年級的田野考古學，石先生就個人經驗，講授遺址的地形、測量的方法、製圖的方法、現象的辨識、墓葬的處理、窖穴的處理、遺物的處理等等內容，將安陽考古發掘的情形從第一次講到最後一次在方法上的異同，同時帶領學生進行測量、標本整理。由於田野考古學除了注重課堂講授之外，也必須注重田野實習，第一次田野實習課選定桃園縣大園鄉大園尖山遺址（1953），除了發掘之外，也曾進行環島的考古調查，這樣的田野實習工作日後成為考古人類學系的特色，一直持續至今。石先生接著到大甲麻頭路遺址（1954）、台北圓山遺址（1954）、樹林狗蹄山遺址（1955）、東海岸調查（1956）、大甲番仔園遺址（1957）、大坌坑與十三行遺址（1959）、集集隘寮遺址（1960），這些考古工作就是當時台灣主要的田野發掘，當時的助教就是宋文薰先生，宋先生的調查以及發掘經驗，可以說是戰後初期跟隨金關丈夫、國分直一先生初步調查的基礎之上，加上大馬璘遺址發掘的學習以及後來協助石璋如先生教學的過程中逐步累積而來。學生當中，第一屆的李亦園先生，第二屆的張光直先生以及稍後的楊君實先生，都曾經從事考古研究工作，尤其是張光直先生日後在中國考古學、台灣考古學以及史前學的領域大放光芒，這和石先生所帶來的田野工作具密切的關連。這個考古學田野教學的傳承經驗，幾乎成為台灣考古學日後研究的基礎與準則，影響台灣考古學既深且遠。石先生同時還影響了前述在大馬璘遺址學習的劉枝萬先生以及隨石璋如先生進行調查工作的文獻工作者盛清沂先生，二位先生雖非考古專業的學者，但是在地方文獻委員會進行了相當數量的調查與發掘研究，為部分區域建立堅實的考古學基礎資料，功不可沒。

石先生是三位來台的安陽考古學者中，唯一在教學的過程當中同時參與台灣考古學研究工作的學者，從來台後就發表了多篇有關台灣考古學研究的論文與報告，

一直到1963年最後一次教授考古學的課程之後才逐漸淡出。^③同一時段前後，由於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的教師體系逐漸完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支援的兼任教師也逐漸減少，可說完成了考古學與民族學的世代交替。從1949到1963年，這個階段台灣考古的研究與教學，在史語所的支援下逐漸茁壯成長，石先生在田野考古學課程的教學與典範建立，具有特別意義。考古人類學系畢業的張光直先生在1964年代表耶魯大學與代表台灣大學的宋文薰先生合作的「台灣史前文化史研究計畫」，加強了台灣考古學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同時也代表在台灣訓練的第一代考古學者完全接替安陽考古學者的位置，以石璋如先生為代表的史語所考古組成員從此退出台灣考古學的研究與教學領域，專注於安陽考古發掘出土遺物的報告撰寫與深入研究。

四、對台灣考古學的影響

石先生雖然僅在短短的十五年間（1949-63）介入台灣考古學的研究與教學，卻對台灣考古學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筆者認為以下四項影響深遠。

1. 建立田野考古學教學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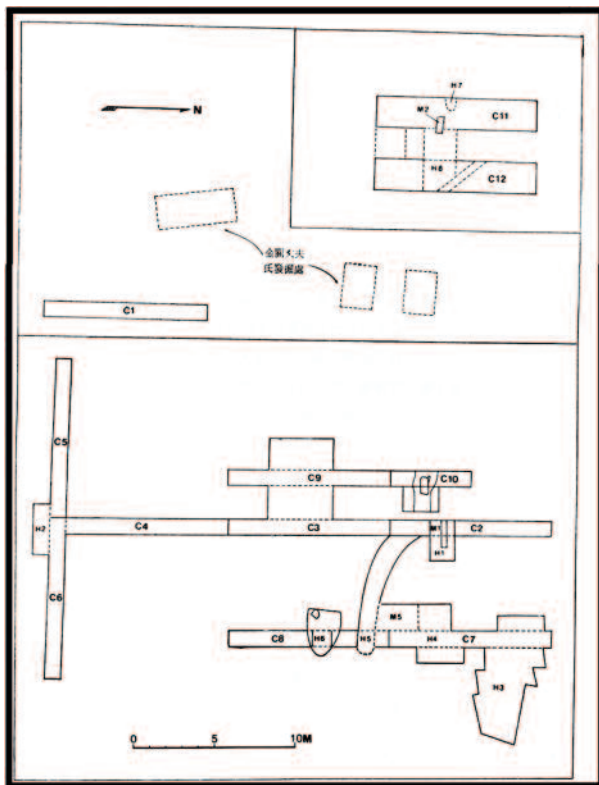
田野考古學教學方法從石先生就已立下應有的標準，第一學期是課堂講授，教授田野考古的理論與方法，第二學期是田野實習，在寒假中前往遺址進行調查與發掘，開學後在室內學習資料整理方法，並完成田野考古報告。石先生認為「田野實習是比較重要的，因為在課堂所學都必須到田野實習才見分曉。……田野只不過是考古的一部份，學不會田野就無法考古。」（陳存恭等 2002：355）

這樣的田野考古教學方法隨後傳承給宋文薰先生，再從宋先生交給黃士強先生，再由近期的年輕考古學教師傳承，雖然在教學內容上略有變更，但石先生所建立的考古學教學標準，到現在沒有改變。台灣考古界目前所有的工作人員，幾乎都在這個教學體系下學習成長。

2. 確立田野考古工作方法

雖然台灣的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教室也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學組同在1928年設立，從事學術的考古學研究工作，但台灣的考古學田野方法在日

^③ 大馬璘遺址的發掘報告雖然在1987年才出刊，（石璋如、劉益昌 1987）但報告的大部份內容是早在發掘完後不久就已完成。



大馬璘遺址的探溝發掘（引自石璋如、劉益昌 1987）

治時期始終未能規整化，尤其是考古學發掘方法。石璋如先生帶來的安陽發掘方法，第一次在大馬璘遺址施行，就是一個規整化的發掘工作。石璋如先生在台灣地區的田野工作與教學，從大馬璘遺址、大園尖山遺址、圓山遺址、大甲番仔園遺址、樹林狗蹄山遺址、八里大盆坑、十三行遺址、集集隘寮遺址的發掘與教學，幾乎都採取探溝發掘與現象塊狀擴充並行的方法進行發掘工作，從安陽考古所建立的點、線、面、體的發掘方法，也就是抽樣、探溝、探坑系統化發掘的各種方法，是日後台灣考古學界遵循的田野方法，雖有部份方法改變或不同，但大體一致。

3. 培養後進考古工作者

在李濟之先生的規劃當中，史語所從事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國考古學研究，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則以台灣考古研究為重心，自然培養台灣本土的考古學者，成為重要的任務。石先生在考古學的研究過程當中，培養的第一代學者包括宋文薰、劉斌雄、張光直等重要的考古家，影響劉枝萬、盛清沂等文獻學者從事考古學基本調查工作，在1960年代以前和史語所考古組的其他同仁，一起將台灣考古學界的第一

代本土學者扶植成可以獨立從事考古學的研究者，才逐漸淡出台灣考古的研究圈子，走向安陽考古的空間，這是其他學者所不及的。

4. 提倡考古學類比運用

今日的考古學不論在哪一學派，都可以發現以民族誌類比的方法從事研究工作，就類比研究而言，石先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前瞻者，從安陽發掘之後的調查，到戰後播遷來台後進行的當代民俗、手工業甚至喪葬儀禮的調查記錄，都是石先生類比考古學研究的基礎資料，今天考古學家大肆使用類比研究，其實石先生早在1930年代就開始，來台後也做了相當多原住民生活與考古學研究的類比，雖然這方面未能深入影響台灣考古學界，但仍為台灣考古學界提倡新的研究方式。

五、後語

從1949年就帶著我們走台灣考古的這條路，石先生雖然在今年（2004）春天離開我們，但是他所傳承的學問，仍然深刻的留在台灣考古學界，忝為台灣考古學界的一份子，也是石先生再傳的後學晚輩，個人除了努力延續石先生的考古學香火，也敬祝石先生一路平安。

參考書目

石璋如

- 1956 〈關中考古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7：205-323。
- 1975 〈李濟先生與中國考古學〉，《中華文化復興月刊》8.5：6-16。

石璋如、劉益昌

- 1987 《大馬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九，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張光直

- 1995 《考古人類學隨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訪問

- 2002 《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8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國分直一

- 1951 〈戰後台灣における史學民族學界〉，《東洋史研究》11.2：160-171。